

这个现象得归咎于两个因素。

一、我国缺乏群众媒体教育。由于主题的讨论需要，本文特地指出群众媒体教育的不足，而事实上马来西亚所缺乏的群众教育岂只是媒体教育而已？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固然推动了教育普及化，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狭隘的学科划分，以及私立学院基于市场考量而偏重以经济效益为取向的课程内容使然，虽然学位越来越高，可是除了谋生所需的技能知识以外，许多所谓受教育的群众 (educated public) 仍然缺乏为自己深刻剖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他们对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现象的看法大多停留在“感想式”的水平，缺乏社会科学或哲学的视角和学理的分析，甚至是一种没有结合实际情境 (without context) 的错误评述。

二、大多数大专院校的传播学或媒体课程深受主流、保守的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学派媒体观影响，强调大众媒体维持社会平衡与共识，以及如何与其他社会系统有功能上的相关性，结果掉入了过度重视培训“实用”的传播生产技能，也就是以实务技术训练做为传播学或新闻学的主轴。私立学院的传播课程的设计，尤其表现了这种倾向，即使是以中文做为主要教学语言的传播学院，例如吉隆坡的韩新传播学院、大马新闻资讯学院及中央艺术学院，亦不例外。

这两个因素使然，造成不只是一般“大众”对大众媒体的性质、定位、角色与权力运作缺乏全面认识，甚至媒体工作者和传播科本科学学生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而马来西亚的情况确实如此。

马来西亚传播教育概况

就学术发展的历史而言，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学术界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有感于战时政治宣传之利害，而开始积极地

为何媒体教育？

大众媒体已经是一种和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讯息来源，自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经常让大众媒体决定我们的思考、选择与决策，但我们却懵然不知。大众媒体绝不只是一种讯息的载体而已，其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岂只是将讯息大量而广泛地传送，更是一种思想的生产机器和管理者。

然而，我们对大众媒体的认识有多少呢？大众媒体与我们的思想，包括信仰、迷信、偏见等人类活动的产生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对大众媒体的认识却常常局限于“它是一种传达讯息的工具”这个水平而已，不但迷信于大众媒体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公正性，也丧失了对大众媒体有所要求和期待的热情。

媒体教育： 实务技术抑或学术训练？

——马来西亚媒体教育方向刍议

研究大众媒体的讯息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影响。这种行为主义 (Behaviourism) 的研究取向后来主导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

美国是传播学研究的其中一个重镇，但是近十年来，由于经费与资源缺乏所致，美国大学的传播学及新闻学的科系开始面对取消、缩减、改组或合并的命运。

这种情况和亚洲国家恰恰相反。由于近 20 年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颇好，而传播学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因此亚洲国家近十年来正在大事开发传播教育。如果了解亚洲国家的决策者的大众媒体观，我们委实不必对亚洲国家大事开发传播教育的局面感到讶异。美国传播学者 Daniel Lerner 及 Wilbur Schramm 等人主导的“传播与国家发展典范”不但曾在传播学界风行一时，而且也对亚洲国家的决策者产生巨大影响。这个研究典范视大众媒体为有助于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神奇繁衍器” (Magic Multiplier)。这种主流观念在亚洲十分受落，发展传播教育成了亚洲发展中国家视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工程之一，这些国家的政策决策者期望借助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对人民产生“移情” (Empathy) 作用，使他们积极、正面地配合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

马来西亚大专院校的传播学教育始于 70 年代。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理大) 是最早开办传播系的大专院校，至今，理大传播学院仍是国内办得最出色的一个传播学院。后来，玛拉工艺学院、国民大学、博特拉大学、马来亚大学、国际回教大学、砂朥越马来西亚大学，也先后开办传播学课程。90 年代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私立学院也都纷纷开办传播课程。虽然马来西亚的传播教育在近十年来开发得相当快，但是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大多数还是以脱离本地社会情境的实务技术训练为主，无法为学生提供相对全面、将大众媒体的知识结合在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各种权力关系上。理大传播学院讲师 Zaharom Nain 及 Carol Kim Kirton (1990: 1) 评论这种情况时，曾这么写道：

“传播研究在马来西亚发展得很快，(但是) 其哲学的和理论的基础却仍十分摇摆不定，对这个领域里的变迁不知不觉，更令人难过的是，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发展反应迟钝。”

“这种悲哀的局面……是由于马来西亚高等学府里的大多数传播教育者都倾向于天真及错误地接纳大量未加批判及过时的概念和模式。”

这种情况在国立大学或私立学院皆有之，但以私立学院的情况尤其显著。许多私立学院的传播课程实际上是那些普遍上被视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业管理、公关、广告与图像设计的“结种”，而这种以商业价值为导向的课程设计，提供的只是技能的训练(例如如何策划有效的广告或公关活动)，而不是深刻地探讨广告与公关活动的社会意涵(例如它对某个特定社会的冲击、如何影响社会的权力关系等)。易言之，学生所学的技能往往脱离了其身处的社会实际情境。因此，实务技术训练未必就是一般人所要求的“实用”课程，而理论知识的训练也未必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实际的纸上谈兵。

上述两位传播学者所提的“悲哀的局面”，不只是发生在大专学府的讲师身上，也可以从一般公众、学生及媒体主管的观点中找到蛛丝马迹。时下许多物色传播课程的学生或家长普遍上都误以为只要有很多“实务”的科目，就是“实用”的课程，却忽视了脱离社会情境的实务训练，并不能有效地培养能够敏锐地应付各种工作挑战与场面的学生。

理论学习与实务训练：鱼与熊掌？

这种误解使到传播教育的决策者，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在理

论学习与实务技术训练两方面，究竟该以何者为重？

传播教育的基本目的在提升学生下列各方面的能力与知识：一、思考分析的能力；二、特定范畴的知识，包括传播学及别的社会科学等；三、用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能力（陈韬文，1999:138）这种传播教育的基础是要培养具备高度的分析力与创意、丰富的知识和有效的表达力。因此看来，相对于所谓的实务技术训练，思考分析能力应该是传播教育的根本。

但是在马来西亚，以提供实务技术训练为主，而学术知识严重贫乏的传播学院，反而较受学生欢迎，甚至给人一种专业的感觉。无论大专学府、媒体业或是一般大众和学生，他们普遍上对传播学或媒体教育已经产生一种刻板化印象和立场，以为传播学类的课程就是一种指导如何生产媒体产品的实务训练。因此，前述那种取舍两难的问题，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与辩论。

这种重实务、轻理论的现象，是人们普遍上将教育当做一种职业训练和谋生工具的观念所产生的结果。传播学科也不例外，比如一提到“新闻系”，很多人自然会把它联想到这是让那些憧憬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学子进入新闻界的一纸“推荐信”，让他们持着专业文凭进入专业领域。当你把教育当做一种职业训练时，很自然地，你就会认为有越多实务训练的传播学课程，就是“好”课程，因为它能让学生掌握在媒体业谋生的技能。

大多数人的“误解”形成了一种市场要求，于是许多私立学院开办的传播课程，其课程内容不是过度偏向实务训练，就是美其名为“大众传播文凭”，实际上却是比较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学、会计、广告与公关的混合体，是商业性质课程，更甚于媒体教育。

易言之，市场的要求造成办传播课程的学校舍本逐末，让实务技术训练的偏重走过了头。

实务技术训练最大的目的，是要训练学生利用大众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些学生有能力表达些什么内容呢？这是关系到人的思维能力与知识层面的问题，远比实务技术的掌握更为重要，可是很多人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

一旦实务技术训练走过头，有可能造成两边不着岸的结果：实务技术未必掌握得好，社会科学的知识极度贫瘠。这种结果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媒体业的实务技术不断而且快速地变化与更新，再加上不同类型的媒体和不同的媒体机构，都有本身一套不同的作业流程与制作方法，因此学院里的实务技术训练，一来不可能做到符合所有媒体的需求，二来学院里的训练一般上没有直接涉及社会上各种利害关系的角力，也就只是一种“实习”而非“实战”经验。如此一来，投身媒体业（甚至任何一种行业）的人，都得经过一段在职训练与实战经验，对新闻工作的掌握方会日趋成熟。

实务经验最好的训练场地是面对各种赤裸裸的社会与政治丑态的新闻前线，把在学时的大部份时间用在实务技术训练，最终极有可能白忙一场。与其如此，不如趁着学生们不必为生活与工作压力而分心、烦恼的黄金岁月，让他们有系统地问学，建立扎实的知识基础。繁琐、紧张的新闻作业常常无法让媒体工作者持续及有系统地问学和求知。

许多媒体机构的主管经常埋怨本地一些新闻学院毕业的新人，非但无法担当重责，甚至无法做好采访和写好一篇新闻报道或评论。这些主管通常会笼统地将问题归咎于新闻学院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训练，却没有看到问题出在哪里。这些新闻学院不是没有提供采访与写作的实务训练，而是知识与思考的培训太少。由于知识不足，接获比较“严肃”的采访任务时——例如国际性会议或采访专家学者——他们普遍上面几个难处：一、没有能力消化资料；二、没有能力草拟问题；三、没有能力即席提问。这是认知层面不

足，而不是实务技术训练不足的结果。

理论学习与实务技术的比重——6:4

注重实务技术训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选择。就国内情况而言，如果开办传播学或媒体研究课程非得考虑市场因素的话，我个人能够妥协的知识与实务的比重是6:4——知识学习的比重必须高于实务技术的训练。

理论课程的重要，在于训练学生的思考分析能力，以及帮助他们建立本身的世界观和理念。传播学者 Zaharom Nain、Mustafa K. Anuar 及 Carol Kim Kirton 皆认为，媒体教育应该创造一种批判意识，去批判宰制的团体或阶级为了控制我们的生活而设下的结构性界线。换句话说，媒体教育不应该只是训练学生如何去生产媒体产品，更应该训练他们去“解构”媒体的讯息和看清楚潜在的制度性和组织性权力关系 (Zaharom & Carol 1990: 12; Zaharom & Mustafa 1994: 34-35)。

他们引述巴西教育学家 Paulo Freire 的观点指出，真正的教育始于质疑及测试那些定义我们的实在情况 (reality) 与意识的既定知识 (established knowledge)、规范、价值观、思想与惯例，看一看它们在一个入本身所属的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实体中，是否真实。这个过程，Paulo Freire 称之为“赋予是非之心” (Conscientisation) 的过程，旨在帮助人们对宰制群体及阶级为了控制我们的生活而设下的结构性界限产生批判意识。

然而，这种批判意识不是从天而降，而是需要去经营，理论的学习正是培养这种批判意识的先决条件。

诚如 Zaharom Nain 及 Carol Kim Kirton 所说：

“从来不能这么假设，涉猎实务工作的学生可自动地学到批判的能力，以及可以使媒体去神秘化 (demystify)。批判意识及认识，或‘赋予是非之心’，是必须营造的事物。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要将实务工作与分析活动连结起来。” (1990: 12)

国内的新闻从业员普遍上缺乏批判意识，而是机械化地工作。新闻记者外出采访，回到报社坐在电脑前，机械化地写新闻导言，机械化地取舍新闻内容，遣词用字也未审慎思考与斟酌。不久前本报中文报章大事渲染精神病患引起的血案，并以“疯汉”称谓涉案的精神病患，就是最好的例子。媒体编采人员似乎没有顾及“疯汉”一词带有极度贬义，不但会强化公众对精神病患的偏见与歧视，也将影响精神病患产生消极的自我认识。新闻从业员对语言知识的无知，也不是技术训练不足，而是社会科学知识不足的结果。

另一个现象恐怕更令人担忧，那就是今天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或媒体业似乎没有什么意见、主张或远景。他们似乎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除了采访、写作、播音、摄制节目之外，媒体业实际上还是怎样的一种行业。对于新闻业面对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打压，普遍上也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而“逃避”打压以求自保也能以种种“忍辱负重”的理由加以辩解。

“在地化”——结合当地情境 (Local Context)

社会科学——无论政治学、犯罪学、社会学、经济学或传播学等——的研究必须做到“在地化”。很多人都会想到“在地化”这一概念，但是没有真正思考过所谓的“在地化”需要些什么。大多数人想到的只是符合“人力市场的需要”而已。本文所谓的“在地化”，意指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应该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紧密的结合，而不是天马行空地讨论社会科学理论，却没有

有锁定一个与学生有着共生关系的社会做为讨论与比对的对象。

“在地化”是个重要的原则。以大众媒体业为例，由于每个国家的社会情境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媒体生态与文化也就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大众传播课程，尤其是新闻学课程，通常都会讨论大众媒体做为“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的理论，如果讲师没有将这个概念结合马来西亚的实际环境来讨论，而只是讨论理论上的意义，那就很有可能误导学生天真地以为大众媒体多么伟大，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多么神圣，使对媒体功能的迷信淹没了对媒体应有的批判意识，甚至忽视了大众媒体在本地面对的经济与政治上的箝制。本地华文报章的言论版，经常会有作者谈论“第四权”等与新闻自由有关的话题，但是很多作品都是“没有情境”（without context）的泛泛之谈，足以印证这一点。

结语

我们的社会普遍上以极度简单的思维来看待“工具”——无论是时下流行的字眼“资讯工艺”或本文所谓的“大众媒体”。由于科技发达，他们以为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最明智的决定；对于大众媒体，他们以为只要熟练了生产媒体产品的技能——例如广播员的音质或新闻记者的文笔——就是从事媒体工作的重要条件。然而，一日千里的资讯工艺或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体究竟运载了什么“内容”，却常被忽略。这种对知识的忽略，不但是大众媒体日益肤浅化及庸俗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人类生活方式越来越空虚的根源之一。

理大传播学院讲师 Zaharon Nain 及 Mustafa K. Anuar 曾在 1994 年就传播学课程的方向提出建言，他们认为（1994: 38）：

一、大学的媒体教育部门渴望迎合媒体业的需要，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事，不过它必然会削弱了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

nality)。这些部门必须记得它们最根本及重要的角色是教育学生成为一个好追根究底、具有批判性格、渴求知识及建立知识的人。这种知识必须反映在课程中。

二、由于许多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与开发，至关重要是的，大学不只是一要鼓励批判性地估定这些技术及它们产生的社会意涵的研究，更要提供课程让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去评估它们。

三、提供传播学位的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应该吸收这个批判性元素，因为这是大学为传播学及国内媒体业建立新的及批判性类型的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

四、批判性研究与课程有助于大学在处理与媒体业的关系时，维持其一定程度的学术自主。

这两名传播学者的建言是本文的论述基础，也可供开办传播学或媒体研究课程的教育机构或关心媒体教育的人士反思。

参考书目

- Zaharon Nain & Carol Kim Kirton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in Malaysia: Some Critical Observ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EJC-Osmania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Media and Development, Osmania University, Hyderabad (AP), India, July 12-14, 1990.
- Zaharon Nain & Mustafa K. Anuar (1994), Communications, Curricular and Conformity of National Needs and Market Force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The Needs of the Media*, Kuala Lumpur: AMIC & The Asia Foundation.
- 庄迪澎 (1998), 推广媒体教育, 《雪华青团讯》, 1999 年 3 月。
- 陈鹤文 (1999), 《传播教育的知识结构问题: 思考分析与实务技术训练之间的张力》, 《新闻学研究》, 第 59 期, 1999 年 4 月。
- (原载《南洋商报》《南洋论坛》, 2000 年 12 月 31 日。)